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 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

文/付玉

摘要：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党媒史研究的理论性探讨依然不足，对历史上党媒如何在实践中具体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的梳理就更少了。基于此，本文以广播为切入点，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人民广播事业”的历史景象，探究了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源起、内涵，以及这些实践活动的历史影响。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双办”实践是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具体落实，发挥了基层媒体沟通中央、地方、群众的特殊作用，也是农村治理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 广播 基层实践

中国近代广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地方县级广播在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广播事业的政策推动下，广播建设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各县党委接管了旧有的县级广播体系，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新中国的广播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事业由此开始。对当时的农村地区来说，广播相比报纸具有更强的穿透力、亲和力，更有效传播了政策信息，同时增强了民众对政策的理解。这种有效性固然与该媒介的特性相关，但也与这一时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有紧密联系。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源起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我党提出并实行的依靠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办报的工作方针，是马列新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界对“全党办报”的理解有两种视角：一是办报的主体是党领导的各级机关，即通过党组织和各级党报通讯员共同来办；二是报纸的内容生产者要将党员干部涵盖进来，为党报写稿。同时，学界对“群众办报”的理解也有两个角度：一是报纸的内容生产

者要从党员干部、通讯员扩大到普通群众，让群众参与新闻工作；二是报纸的内容要以受众为中心，考虑人民的需要，重视读者反馈。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策推行下，广播成为党新闻工作的重心，到1965年左右，广播已逐渐覆盖到农村各生产大队，发展日趋成熟。广播发展迅速的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团结全体人民开展战后重建，党的声音急需传达到基层群众中，因此中央和地方需要有效信息传播手段；二是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且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三是报纸发行不足，广播替代报纸，成为解决当时紧迫问题的方案。

广播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工具，其创办吸收、借鉴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根据“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要求，在广播建设上，基层党组织应创建党的广播，同时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广播。除此要求之外，基层广播还有其特殊性，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是连接中央、省一级组织与基层党政府组织的纽带，在内容的传递上，它不仅需要将上级政策传达到基层政府，同时也需要将国家政策和基层的具体实施政策传递给群众（如图），因此，基层广播在沟通国家、地方和民众三方

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是二位一体的关系，二者背后的诉求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既领导又代表本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党办广播既要发挥组织力量，实现党的根本诉求，又要吸纳群众办广播，确保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二者的本质诉求都是要实现群众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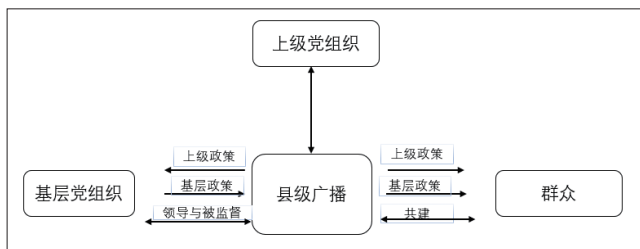


图 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路线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的基层实践

在各地地方县委的领导下，党的广播建设事业体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实践逻辑，在坚持党对广播事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上以人民为中心，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与现实需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广播制度。

1. 广播建设基本覆盖农村地区。1950年左右，各地方县广播建设事业开始起步，由当地县委宣传部领导，县财政拨款，这时候多叫收音站，其设备简陋，一般有1~2名专职收音员，负责开收音机并收听节目。1956年左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收音站改为县有线广播站，后改名县人民广播站，起初广播站没有录音设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逐渐有了录音设备。县广播站成立后，广播开始向农村发展。当时县广播站专职人员同时需负责铺设广播线路到各区和乡村，广播线路多是由电话线路传输信号，部分乡村地区倡导用户自架线路。1958—1960年间，农村广播线路增加，同时随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各地又增设公社转播站。例如，在江苏省常州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全县38个公社都建立了转播站，转播县广播站信号，所有农村生产大队接通广播，安装收听喇叭3658只。到1965年，中国基层逐步建立起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大队广播室三级广播网络。

2. 发展、壮大农村业余通讯员队伍。县级广播电台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不多于10人，因此很少有来自农村的新闻报道。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村，并解决供稿不足问题，

广播站主要以发展农村业余通讯员为主。例如，在1957年浙江省余姚县（现余姚市，后同）广播站收到来稿数量1000篇，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每年3600篇。1960年余姚县公社建立广播站后，每个公社都配备了1名专职或者兼职报道员负责宣传。在贵州省湄潭县，1964年广播站自办节目的稿件来源主要是业余通讯员供给，业余通讯员有157人，编为15个通讯组，农村8个组，县城机关、厂矿7个组。从现有的各地方县志、县广播电视志记载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已基本形成以农民通讯员为骨干的通讯报道网，农民作为听众又作为内容的生产者，有效保证了广播内容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

3. 形成适应现实情境的信息沟通方式。县广播不仅是各级党委组织沟通的工具，也是面向民众沟通的媒介。在传达中央政策或相关信息时，县收音站一般是收抄中央和省广播电台新闻或其他重要节目要点，然后编成油印资料送县委领导参阅，而对于群众，则通过黑板报等方式传递到民众中去。除了黑板报，收听广播形式多样，如下乡组织群众听广播，在村庄还未通喇叭时，工作人员通常带上收音机到村里固定的收听点，组织群众收听新闻等节目。有些广播站机动性的广播宣传车，常跑到村寨宣传。在播出时间上，有些广播站选择群众举办“集市”的时候，以便覆盖更多人群。在播放语言上，充分考虑了民众的真实情况，初期因农民听不懂普通话，大部分节目以方言播音，1960年初通常使用方言、普通话掺杂，到1965年前后逐步过渡到普通话播音。

4. 转播节目与自办节目相结合。县级广播站在创办初期一般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省广播电台的新闻类节目，同时地方县领导的重要讲话以及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也会通过广播站直播出去。1960年之前，县广播站没有专职的文艺职员，在播放文艺内容方面仅限于播放唱片，包括革命歌曲、本地小调等。有了录音机后，开始自办本地新闻、文艺等节目，这时多邀请县领导、农业专家、地方模范、民间艺人等录制节目，如湖南省衡南县在20世纪60年代自办的栏目有《衡南新闻》《科技知识》《农民之友》《文艺节目》《天气预报》等，自办节目每次播放40分钟，还有些节目比如《普通话语音讲座》《听众园地》（科学卫生、家庭生活）对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都有教育性意义。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办“广播”、群众办“广播”基层实践的影响

在“双办”实践中，广播内容紧密围绕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并与时事政策等结合，培养了有情感、有温度、有人

情味的乡村社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服务政治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初期县广播站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大办高级社，城镇开展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组织内容，1958年开始围绕公社化运动播放新闻。这一时期县级广播站重点播放并解读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帮助农民了解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为配合纲要，各地县级广播站积极宣传相关政策，如浙江省黄岩县（现台州市黄岩区）县委在广播站召开“进一步掀起兴修水利、积肥和冬季生产运动，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的广播大会；浙江省余杭县广播站举办了系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座，为群众解读纲要。当时的广播站播音内容无论是配合国家政策，还是适应春耕、秋收、抗灾的特殊时期，都与国家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紧密关联，这对于积极动员民众参与生产、提升劳动积极性是有鼓舞作用的。

2. 协助解决群众问题，密切党群关系。党群关系建立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关注并解决农村实际问题。1954年，因发洪水，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县委宣传部钱世康和收音员吴文粹带着干电池收音机到百丈区江心洲组织群众收听天气预报动员村民搬迁。为帮助农民掌握科学生产方法，湖南省祁东县每周日晚上举办“农业技术讲座”供群众学习，浙江省余杭县的《农业技术指导》在农民中很受欢迎，有听众来信讲到“这是为我们农民开办的学校”，县广播站在介绍长命公社连作稻采取“早种、密植、浓插”丰产经验后，良渚等其他公社也都采取这种方法。湖北省汉阳县（现武汉市汉阳区）当时一名农村妇女提到广播时，说“广播教我们怎样种棉花、防猪瘟，不信迷信，我们这里的道士也不搞那个活了”，可见广播在农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开始，县广播站还会不定时播放一些活动通知、寻人寻物启事等，均无偿服务，同时广播站会向群众公开公社内部账目、整顿财务，从而消除社员顾虑。由此可见，广播内容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服务群众，而且还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3. 弘扬地方文化，活跃群众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发展落后，文化生活匮乏，广播自办的文艺节目给民众带来生活上的乐趣。广播文艺节目活跃了群众生活，起到鼓舞志气、凝聚人心的作用。面临文艺节目缺人、缺内容的窘境，县级广播站巧妙创造条件，丰富节目内容。广播站在没有录音设备支撑的情况下，将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农民、民间艺人等汇集在一起，邀请他们直接在广播机房表演地方戏曲和歌剧等节目，并用扩音器直接播放出去。如湖南的渔鼓、花鼓戏等都是通过民间

艺人传播到民众那里。在一些革命歌曲的播出上，设有新歌教唱栏目，请当地唱歌比较好的村民到广播面前录制新歌，讲解歌词，并教授群众演唱。广播文艺节目占全天播出时间的1/3以上，最高达2/3。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地方节目既传播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又在物质条件贫乏的情况下满足了群众的精神需求。

四、结语

县级党媒是党舆论工作的基层阵地，其覆盖人群广、与群众联系最密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广播在疫情防控中重新焕发生机，引起了学界、业界对农村广播这一“旧”媒介的重视，再次凸显了广播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今天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其落脚点是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建设，总结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双办的历史经验，如：播出内容贴近群众并服务群众生活；采用群众接受的方式与群众共建广播，密切联系群众并传承本地文化等，这些做法对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讲师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美丽乡村建设中生态理念的传播与群众动员”（项目编号：Y201942022）、省属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数字乡村战略下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创新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K209907299001-223）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朱清河，王青.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历史缘起与建构动力[J]. 新闻春秋，2020(03).
- [2]陈力丹. 毛泽东论群众办报和全党办报[J]. 新闻界，2017(11).
- [3]郑保卫.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及实践传统[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09).
- [4]林颖，吴鼎铭. 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J]. 新闻界，2015(21).
- [5]衡阳市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 衡阳市广播电视志（1949—2009）[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
- [6]武进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 武进广播电视志（1932—2009）[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
- [7]余姚市广播电视台. 余姚广播电视志[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8]青田县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 青田县广播电视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9]黄岩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 黄岩广播电视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10]余杭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 余杭广播电视志[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编辑：孙莹】